

羅伯特·威爾 著；吳萬偉 譯

緒論

本文主要根據 2004 年夏天作者和阿列克斯·德伊（Alex Day）以及中國研究所的另外一個學生對工人，農民，運動組織者和左派積極分子的一系列調查寫成，也是奧克蘭研究所（Oakland Institute）出版的更長的特別報告的一部分。

這些訪談主要集中在北京及其郊區，也包括東北的吉林省，中部河南省的鄭州和開封等城市。我們所瞭解的情況清楚反映了毛澤東去世後三十年巨大社會變革的影響，在他領導下推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政策被拆除，轉而回到“資本主義道路”，讓無產階級出於越來越危險的境地。在這個曾經是最平等的社會裡也出現了迅速增大的貧富兩極化趨勢，特別有錢的上層精英和生活水準日益惡化的位於地層的廣大工人農民。充分說明這點的是，2006 年《財富》（Fortune）全球富豪榜包括中國大陸的 7 位和香港的 1 位富豪。雖然他們的財富和美國或別的地區的富豪相比還比較少，但是他們代表了中國全面推行的資本主義的到來。猖獗的腐敗把黨政領導和企業管理者團結起來，加上新興的私人企業家形成財富迅速增長的資本家階層，而工人階級面臨過去 50 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剝削。

我們所採訪的工人是從國有企業下崗的數千萬工人的一部分，國有企業從前是社會經濟的支柱，他們在丟掉工作的同時也失去了單位提供的社會保障的一切，包括住房，教育，醫療保健，退休金等等。因為這些國有企業都變成了追求利潤的公司，不管是直接賣給私人投資者還是被廠長或者黨政官員變成半私有化，腐敗是非常普遍的。

我們採訪的農民正掙扎著面對農村社會被迫的瓦解和家庭責任制的長期的影響，每個家庭和村子簽訂合同得到一片耕種的土地。隨著國家對全球市場的不斷開放，地方官員大量向開發商出售土地，對於村民卻沒有足夠的補償，農村地區的環境破壞非常嚴重，這個政策讓數億人掙扎於謀生的方法，剝奪了他們從前享受的集體經濟的社會支持。超過一億的人成為城市的打工者，在建築工地上幹活，在新的出口為主的工廠幹活，或者最髒最危險的工作，他們缺乏最基本的權利。對於許多打工者來說，在他們半永久地在城市居住下來後條件就越來越糟，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大，健康問題就隨之而來。

過去幾十年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和犧牲而贏得的權利消失了，中國工人階級在面對不斷惡化的條件面前並不是消極被動的，階級衝突和社會動亂的規模都是過去幾十年沒有見過的。今天的中國工人，農民，打工者舉行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抗議，有時候達上萬人，並與當局發生暴力衝突。甚至公安部部長公

佈的數字都承認“群體事件，抗議和動亂”從十年前的 10000 件上升到 2003 年的 58000 件，到 2004 年的 74000 件。(《紐約時報》2005 年 8 月 24 日)不斷增加的社會不穩定的威脅代表了對高層黨政領導的日益深刻的挑戰，已經造成政策上的改變，企圖避免更大的動亂。即使多數人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中富裕起來的所謂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管理者階層和迅速擴張的大學畢業生也在分化。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是免費的大學教育，但是現在不斷增加的教育成本讓許多人尤其是工人階級覺得根本上不起，更糟糕的是，大學畢業生越來越難找到工作。市場的壓力甚至讓有錢的人遭受損失。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豐富的消費品和食品，更大的流動性和工作機會對千百萬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增大的階級鴻溝和不安全感的升高。結果中國進入一個階級鬥爭加劇，政治不穩定無法輕易解決的時期。工人階級前進的道路更加困難，左派的復興，雖然意義很大，卻仍然處在早期階段。本文探討這些複雜性和可能性。為了保護當事人，我基本上刪去了個人和單位的名稱。

衝突和團結

至少從表面上看，城市工人，打工者和農民，甚至包括新興中產階級的多數成員的條件將提供廣泛團結起來的基礎來反對在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下剝削他們，並將中國向世界經濟力量開放的人。但是正如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類似，工人階級的團結理論上說說容易，實際上，傳統的偏見，尤其是中國多數城鎮居民對農民的蔑視根深蒂固，加上從農村地區來到城市的大量民工的競爭新形式，和慣於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的當權者的操縱下都使團結非常困難。

比如，當問到北京的工人是否感到民工搶了他們的工作，我們採訪的一個積極分子回答說“是的，尤其是那些下崗的人會有這種感覺。”。他們中的許多人瞧不起民工。在一場暴風雨後的街道清理過程中，有些城市工人說“這就是民工到這裡做的事情，家裡從來沒有見過錢。”就好像要證實這個形象，《紐約時報》2006 年 4 月 3 日報導說上海市的民工清潔工，其中一個要為大女兒交一萬元附加費才能上高中，為二女兒上小學交 1000 元附加費。但是這種感情是相互的，民工們的說法是“下崗工人活該。”

種族和移民問題苦惱不堪的美國再熟悉不過的模式，政府試圖說明民工討要工資，和其他應得的權益，有些工人則認為這是偏袒優惠。媒體為這些分裂火上澆油，讓不同團體間的關係更加緊張，說城市無產階級只想得到外國人的工作，說民工願意“免費”幹活，讓下崗工人模仿他們，造成相互的怨恨。但是，城鄉收入不斷增加的差距現在達到 3.3 比 1，“高於全世界最高的差距的美國”為這樣的操縱提供了燃料。(《紐約時報》2006 年 4 月 12 日)

工農分裂的加劇更明顯地被鄭州電子傳輸設備廠的工人感受到了，那裡在2001年發生了重大的衝突。就在企業被分割出售時，員警逮捕了晚上抗議的人，他們闖入企業就像小偷一樣盜竊機器設備。他們還一天給50元雇傭農民拖運機器。這導致長時間的鬥爭。部分是想避免引起政府使用員警來做骯髒工作的公眾反應，他們雇傭農民作為暴徒，頭戴鋼盔，使用武器毆打工人。大概30輛裝滿500名農民暴徒的卡車開進工廠，這個例子是鄭州發生事情的縮影。一個積極分子說2001年7月14日當工廠的工人們一敲鐘，“每個人都出來了”造成長達4個小時的農民和工人的械鬥。那天工人們取得勝利，因為來自其他工廠的工人來增援了，總共有4萬人之多。雖然8名工人涉嫌破壞工廠財產被逮捕，但是他們也得到了法律援助，資本家再次失敗。正如一個工人在談到改革前他們享有的權利時說的，“我們的法律，毛澤東的法律”得到了尊重“有這麼多人，政府害怕了。人民行動的規模讓政府感到猶豫不決，但是在資本家的壓力下，工人們又遭到逮捕，這次由公安員警繞過法院直接進行，工人和農民的戰鬥持續了10天。這樣一來，他們使用農民打手把工人們趕出工廠，馬上把東西賣光，解雇了5600人。接著把廠房拆掉，包括工人的住房，把土地賣給了要在這裡蓋商場和高檔住房的私人開發商。現在，沒有了工作和住房，人人都害怕繼續鬥爭下去。員警有時候自己就充當暴徒了，脫掉制服，充當保護資本家的打手，甚至使用刀子。在一個陶瓷廠，一群暴徒幾乎將一個工人領袖活活打死，但是當局聽任這種事情發生，對後來的投訴置若罔聞。

在這樣的情況下，員警和政府當局不僅直接攻擊和鎮壓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工人，而且鼓動勞動階層的不同部分之間相互殘殺。儘管需要團結起來，但是這種經歷讓人們很難克服現存的偏見和分裂。正如電子設備廠一名工人積極分子說的“工人農民應該是一家的，我們應該聯合起來，爭取自己的利益。”站在對立面的人只是看到了眼前短期的小利。在工廠，甚至員警的頭目也說他不願意打人，只是因為在壓力面前不得不做。一工人對他說“你就像一條狗，”員警回答說“不錯，但是如果我不咬你，他們會把我的皮剝了。”國有企業被私人老闆買下讓分裂更加嚴重。新工廠建立在這樣的地區，工人大部分來自農村，他們的工資低廉，不用提供住房和其他福利。而且，正如一個工人所說，和美國不一樣，中國的國有企業下崗工人不能得到服務性工作，因為這些工作都是農民在做，他們工資低，容易控制。儘管希望一起工作，這樣的條件不可避免地造成勞動階層各部分之間的怨恨。

儘管有這些分裂和衝突，仍然有人不斷努力把城市工人和農民在更廣泛的，更高層次上團結起來，這些農民包括仍然在農村幹活的人和來到城市的打工者。1997年鄭州發生的示威者就包括鄭州的造紙，紡織，電子設備工廠來的，該城市的13000名計程車司機罷工，都顯示成千上萬的不同行業的工人，社區居民都出來支持那些反對私有化的人，抗議工作和福利的喪失，抗議高額的稅負和各

種費用。但是，中國更普遍的模式是各自工廠的工人獨自面對老闆和與老闆沆瀣一氣的政府官員。通常的情況是，這些對抗行為，包括橫臥鐵軌，阻斷高速公路，包圍或者佔據辦公大樓，或者城市裡的罷工停業，但是結果往往是一次性的對受到影響的工人的低額補償，根本不夠為他們提供長期的支持，但是足以讓他們最直接的要求得到滿足。為了超越這個相對孤立的鬥爭方式，在很多情況下根本無法阻止私有化，裁減工人，失去服務和安全的大趨勢，鄭州各個行業的工人開始聯合起來。在很多國有企業都倒閉，造成 10 萬人失業的開封也一樣，工人們表達了為了成功必須緊密團結起來的需要。只是在最近，來自不同工廠的人，很多已經失去了工作，個別仍然在職開始團結起來，組織來自不同企業的工人代表開會，組織聯合起來的抗議行動，吸引所有企業都參加。我們訪問的積極分子計畫今年晚些時候聯合該城市的所有工廠的工人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但是這樣的聯合行動的前景是很不確定的。城市無產階級存在的分裂，經濟的，年齡的，甚至政治上的，有些工人贊成“改革”和政府，有些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即使在我們參觀的鄭州一個工人集中的地區的公園，工人和退休人員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分開的，左派佔據某些區域，通常在白天活動，右派在其他地方，通常在夜晚活動。正如我們感受到的，當我們簡單地和每天到那裡休閒的人交談時，辯論馬上就非常激烈，有時候甚至帶有威脅的意味。同樣的，工人和農民團結起來也很困難，民工充當了中間人的角色。儘管有願望團結起來，但是各自條件和政府對待的方式的區別不利於更高程度的團結。

在改革的情況下，已經有部分的財富倒掛。不管在城市還是在鄉下，我們訪談的人都說當今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有些農民實際上比許多城市工人生活還好些。他們或許仍然貧窮，仍然為生存而掙扎，最貧窮的農民仍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但是他們至少還有一塊兒可以耕種的土地，即便最貧窮的民工還可以回到自己的村子裡，如果城市裡實在呆不下去的話。但是對於沒有技術的城市工人，尤其是那些下崗的人，什麼都沒有了，真的再次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了，沒有任何生產的方式，如果沒有外來的幫助只有等著餓死。如果他們父母患病，孩子上學要交學費，那可真是讓人絕望啊。只有那些有技術，或者有能力做點小本生意的人才能和有土地的農民那樣維持基本的溫飽。

結果，工人和農民在行動上的一致同樣很難達到。通常的情況是，抗議和示威遊行幾乎同時在城市和周圍的鄉村進行。即使在我們短暫停留的一段時間內，就聽到鄭州和開封市及其附近地區並行的事件。在開封，一個工廠有 20 名工人被逮捕，同一天愛旁邊一個縣農民在抗議，一個工人說他們起來鬧事，“搞破壞”，破壞政府辦公樓，阻斷高速公路，因為他們的農田被用來修路，他們被騙了。但是這兩起幾乎同時發生的事件相互並沒有聯繫，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工人農民共

同抗議的情況出現。

而且，政府對這兩個群體舉行的抗議示威活動的反應也是不一樣的。城市工人面臨地方當局非常嚴厲的鎮壓，因為他們的鬥爭容易被公眾所看到，破壞城市權力席位的穩固，直接挑戰改革的核心---企業私有化和新資產階級的形成。正如一個工人說的，他和像他一樣的許多人非常憤怒，“他們需要聯合起來，暴動，但是和美國不一樣，他們甚至沒有權利談論自己的處境。”但是，他們“不怕死，因為他們什麼也沒有。”因此，他們會繼續鬥爭。

大規模的勞工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有時候取得地區性勝利，但是多數情況下工人領袖被逮捕，被抓起來。相反，至少在檔上，改善農村的生活條件是政府官方的政策，但是對農民抗議的鎮壓更加野蠻，因為這往往是公眾看不見的地方，除非規模特別大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比如2005年12月廣東東州村民20人被槍殺的事件，村民抗議政府徵用土地建電廠對土地補償費不足。儘管有這些分裂和障礙，人們的感覺是城市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可能很快找到辦法合流，因為農民越來越憤怒，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城市工人類似，隨著打工者上了年紀，面臨的情況就日益惡化。說明組織工人階級的積極分子試圖把兩股勢力聯合起來，但是這個過程是漫長和艱苦的，現在只是初步在兩者間搭起橋樑。

左派的回歸

民工，農民，城市工人階級緊密團結起來的可能性尤其得到有中國社會主義鬥爭經驗的人和瞭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的支持。這個歷史遺產對於當今中國左派的復興有著根本的意義。正如鄭州一個從前的紅衛兵說的，最瞭解兩條路線鬥爭，非常清晰的分界社會主義革命和當今的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是工人階級本身，而不是知識份子。現在需要反腐敗，尤其是不僅反對狹隘意義上的金融瀆職和貪污受賄，雖然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是廣泛意義上的反對黨政官員，管理者，和企業老闆勾結徹底把國有資產轉變成新興資本家的私人財產，把工人和農民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的財富揮霍掉。革命的理論，精神，和實踐在工人積極分子身上仍然鮮活，尤其在鄭州和其他一些地方，這些是工人運動的核心地方，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在鄭州有1971年建造的一個雙寶塔式的二七塔，矗立在繁華的鬧市區，來紀念1923年共產黨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當時罷工被地方軍閥鎮壓，100多名工人被打死。毛澤東時代的遺產今天仍然保存完好，工人階級的覺悟非常高，導致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鄭州和工人階級的討論中印象深刻的方面還有他們對從前工作的工廠的主人翁意識。雖然在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的社會所有權和參與權局限性明顯，在鄧小平掠奪式改革時，證明用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是遠遠不夠的。但是毫無疑問，

他們強烈感受到這些工廠從根本上說是“他們的”。正如一個工人說的，電子傳輸設備廠是“工人們用血汗建成的”，他們不願意眼睜睜看著工廠被資本家拿走，被私有化，它屬於整個國家，是他們工人階級集體經濟的積累。在毛時代，工人們工廠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而且往往被採納。”這個現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達到高潮。那時候，“他們是領導階級，工人階級說了算。”但是現在沒有人聽他們的，他們沒有了權力。一次又一次，這些工人表達了對主人公意識的失落，集體財產被事實上偷走了，他們為工廠幹了一輩子，他們從前享受的各種權利全部被剝奪了。鄭州一個工人從理論上分析這個情況，解釋說現在的體系是“官僚資本主義”，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這個分析直接來自列寧的“怎麼辦？”“從表面看是經濟問題，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主要是政治問題。他說，中國“和從來沒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美國不一樣，年紀大些的工人瞭解歷史背景，許多人經歷過毛澤東時代和文化大革命。他們知道毛澤東思想，他們這代人希望中國回到毛澤東的道路上，這是保護社會主義道路的國際主義鬥爭的一部分。”

這個工人喜歡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為什麼讓中國回到社會主義道路很重要呢？西方需要詳細瞭解。這是個長期的鬥爭。他希望中國工人慢慢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最終會取得勝利的。但是他也警告如果現在的運動不能很快躍上新的臺階，年輕的工人會認為只是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經濟鬥爭。這是反社會主義改革階段的遺產，鄧小平的名言比如“致富光榮”。這些言論破壞年輕工人的思想。“很多工人害怕見面和討論這些問題。”我們聽到上了年紀的工人不止一次表達這樣的心態。

可能部分因為這個原因，那些仍然為社會主義鬥爭的人已經發現別的方式傳達他們的意識和經驗，使用文化形式，而不是政治或者經濟形式，讓革命的遺產傳遞給年輕人。在我們參觀的鄭州工人階級居住區的公園一角，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唱原來的革命歌曲。我們在週末的晚上看到，一百多人，包括退休工人，年輕人甚至還有孩子參加情緒激昂的合唱，有音樂伴奏，有充滿活力的指揮家指揮。他們告訴我們週末的時候參加的人更多，達到上千人。把我們帶到公園的工人說，“我們唱這種歌曲的政治意義就是顯示我們對共產黨現狀的不滿，用毛澤東來對抗它，來提高覺悟。”

這同樣的歷史精神在城市的實際鬥爭中也得到體現。當2000年造紙廠工人罷工的時候，仍然是該地區反抗私有化的“典型”，工人們使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方法，一個積極分子說，把廠長趕出來，佔領工廠，阻止搬運設備，實行工人控制。經過多個回合的較量，工廠的有些地方仍然控制在工人手中，但是這個鬥爭不僅要在市場經濟中活下來，而且面臨官方企圖從經濟上破壞。正如他們的領導解釋的，被關進監獄後，他們採取了這個具體的鬥爭形式，“因為巴黎公

社的原則是永遠存在的。”一個類似的左派分子的歷史視角在電子設備廠鬥爭中得到體現，他們的其中一條標語是“工人們想生產和生活。”但是他們也舉起了旗幟上面寫著“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工人們的其他行動採取了更加明確的政治形式。

就在造紙廠工人暴動的同一年，紀念毛澤東逝世的活動開始。2001年，有上萬名工人集會，周圍是萬名員警，大規模的罷工和衝突。如今，工人們被禁止在毛澤東誕辰或者逝世日來到矗立毛澤東塑像的小廣場上來。但是他們照樣來，並和員警發生衝突。2004年9月9日，一個工人運動積極分子張正堯散發傳單，指責共產黨和政府拋棄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汨濫的腐爛現象。他的傳單還譴責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要求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和傳單的合作者張如泉都被員警從他們家中抓走。他們的案子很快成了中國的轟動一時的案件，從全國各地來的左派分子紛紛來到鄭州抗議當地法院在2004年12月對兩人的秘密審判。兩人都被判三年徒刑。還有兩位幫助撰寫和印刷傳單的戈利英和張慶也被員警騷擾。這四個工人後來就被稱為“鄭州四人”。

在美國發起的請願書交給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呼籲釋放他們，吸引了超過200人的簽名，中國國內和國外各一百人。這是空前的對左派工人表示支持，尤其是考慮到簽名者潛在的風險，把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積極分子和國際同行團結起來。雖然政府沒有直接回應這封請願書，張如泉後來從監獄裡放出來，公開的原因是身體健康原因，但是有些積極分子相信至少部分請願帶來的壓力的結果，和其他相關團結活動，比如在左派網站上對這個案子非常詳細的資訊和分析等。

“鄭州四人”代表了中國工人拒絕接受黨和政府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新條件，堅持左派意識形態和活動的激進主義，以及得到的來自社會各界甚至國外的越來越廣泛的支持。但是這個案件在表明中國左派的新的力量的同時也暴露出中國左派的分裂。首先在“鄭州四人”請願書上簽名的主要是年輕左派分子，運用網際網路迅速傳播，儘管批評他們的前輩甚至導師，這些人至少在剛開始非常猶豫。對於年輕一代左派，站在採取公開左派立場的工人一邊是優先考慮的問題，而不是擔心是否完全政治正確。但是對於上年紀的左派，過去的分裂和因為意識形態和政策的鬥爭常常阻礙整體採取共同行動。對他們來說，為了面對現在的新問題拋棄歷史恩怨就更加困難些。

這些態度上的差異反映了人們廣泛接受的對中國左派三大類別的分析：1) “老左派”，主要是從各級黨和政府官員中成長起來的人，在很多情況下剛開始至少擁抱鄧小平的部分改革，後來當這些政策的資本主義本質越來越明顯的時候開始反對。2) 仍然堅決支持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毛主義分子”，

該派別的龐大根基主要是工人和農民。3) 新左派，就像西方的新左派一樣，尤其是 60 年代的時候，傾向於由更年輕一代構成，主要集中在大學和新的非政府組織中，包括各色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廣泛的社會學和社會民主黨趨勢，但是這些人又常常更願意和毛澤東的追隨者結盟而不是和老左派結盟。但是這三類左派的界限決不是嚴格的，互相排斥的。老左派在全社會都有，既有政府官員也有民間人士，而許多“毛主義分子”和甚至新左派在黨和政府內工作。任何相似的左派劃分，尤其是西方的新左派也不應該過分解讀，因為他們都有各自具體的反映本土鬥爭的中國特色。2001 年，非同尋常的四方政治力量在中央領導人每年夏天都來制訂戰略計畫的海邊小鎮北戴河舉行，由鄭州從前的紅衛兵領袖組織，他在改革後不久坐牢許多年，現在仍然是個積極分子。儘管他們同意擱置是否反對所有的改革政策的爭議，一致反對鄧小平引進的資本主義復辟。

最近，來自一些重點高校，研究所，和機構的高級幹部舉行論壇，對當前形勢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由北京大學校長主持開幕式。他們希望將這個活動變成定期的聚會。這次會議的幕後組織者老黨員解釋說這個活動如果沒有高層部分的支援根本就無法進行。在鄭州，一個由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這個詞在當今中國常常包括比西方同行更激進的人）領導的類似的論壇在過去十年經常舉行，聚集了觀點差異很大的人。他們的共同基礎就是強烈意識到中國社會當前的方向和官方政策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儘管他們背景和途徑各異，多數人基本可以按左派的三類別來劃分：老左派，毛主義者，新左派，不僅黨和政府機構內外，不僅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的各樣的論壇，會議，交叉重疊，相互影響，甚至吸引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在非政府組織內，有些人有強烈的左派背景，為實際的事情工作，比如為農村貧困地區辦學，促進更多工人和農民領導的社會，而不是主流基礎做的那樣。左派的回歸反映了工人階級群眾鬥爭的日益增長的力量，讓它不再可能回避中國的社會危機，和如果沒有當前政策的根本性改變只能讓危機更加深刻的威脅。它重新開闢了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革命的重新到來可能性，不管現在看來多麼渺茫。

左派新開口的著名例子就是“老黨員，幹部，軍官，知識份子”2004 年 10 月寫給胡錦濤的信，題目是“我們對當前政治形勢的觀點和看法”。雖然在口氣上比“鄭州四人”更加尊重，對改革帶來的經濟成效給予相當肯定，但是主題和“鄭州四人”非常接近，呼籲採取改正行動，拋棄資本主義，重新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在對當前現狀的批評上言辭同樣激烈。這兩個檔之間是否有直接的聯繫我們不清楚，但是中國的左派繼續收集支持“鄭州四人”的簽名，新左派擁抱他們事業的急切心情，和毛主義者積極分子的辯護為老左派重新獲得長期以來的批判立場開闢了新的空間，比如給胡錦濤的信。早期革命鬥爭的老戰士願意出來公開反對黨和國家的現行政策是個嶄新的政治氣候。早在 1999 年，我們與老左派的討論中，他們清楚表明面臨的強大的改革情緒的壓力，但是現在，非

常清楚這些從前的領導人和類似地位的人感到可以放開膽量表達自己的看法，影響別人，而且在實踐上也這麼做。

仍在當今社會推行的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形式在有些情況下雖然數量少，但是有時候影響非常大。當然，形式上有點修改以適應市場經濟的新情況。現在有1%的鄉村，總共有幾千個---具體數字變化很大，全看是誰在做測量，具體的標準是什麼---從來沒有完全放棄集體經濟模式。甚至有些推行鄧小平改革的村子又回頭搞集體生產，成為別人探索農村經濟新形式的示範。保持社會主義時代目標和方法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南街村，它是河南省的一個小鎮，離鄭州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路程。該鎮15年20年前重新集體化，形成社會主義公社，所有社員都享受免費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甚至為考上大學的年輕人支付學費。這裡還推行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做法，比如村長的工資並不比一個技術工人更高，而且繼續追求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目標，毛的照片和語錄，連同其他革命領袖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張貼在在村子很多醒目的地方。這裡為村民家庭提供的，水電暖氣等設施齊全的多層高樓的公寓，周圍是一塵不染的街道，公園和休閒場所，村裡有非常漂亮的學校和幼稚園。這樣的安排在中國是非常獨特的，這個現代的像城市有錢人享受的生活的圍牆和門口外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典型的農村環境。

但是即便非常成功，南街村的做法裡面有很多的矛盾，因為它的資金大部分來自外來投資，利用周圍的農民，雖然住房條件不錯，但是顯然並不非常舒服，因為主要的勞動力是在完全融入新資本主義經濟的“村辦企業”裡上班。最近，根據鄭州的積極分子包括陪同我們參觀南街村的人說，它現在面臨嚴峻的經濟困難，主要因為過分擴張新的不熟悉的生產領域。但是儘管有局限性---在周圍都是資本主義，必須在激烈市場競爭中才能生存下來的環境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南街村成為仍然相信中國農村還有另外選擇的人關注的焦點。每天這裡都接待大量的參觀者，成車成車的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和工人來研究如何繼續推行集體生產和分配的。它也得到河南省當局的祝福和保護。2004年老左派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指出南街村是當今農村需要的典型。但是即便在毛澤東時代遺產不明顯的地方，它的經驗和做法仍然是和現在情況進行比較和分析的背景。

2004年夏天一個明顯的重大進展是組成農業合作社的新運動，努力要減輕在全球市場面前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孤立和不安全感。這些合作社主要目標是在市場中形成規模經濟，比如集體購買化肥，農產品價格上更大的操作空間，當然包括給合作社成員提供經濟支援和安全感。這些努力顯然是明顯的和改革時代的任憑個人掙扎保持距離，雖然不能解決農民面臨的嚴峻問題。雖然他們不是要回到集體公社，最多只是一種半集體化，但是他們繼續不僅從革命前的早期合作組織中吸取經驗，也從毛澤東時代農民得到保護的做法中吸取經驗。因此，碰

見我們在東北吉林省四平附近的合作社領導就不是稀罕的事。他向我們詳細分析了農村和城市階級的對比和生存現狀，還有一個年輕的社員與我們進行長時間和深入的討論，從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看中國現在的處境，不僅是國內問題，而且談到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中國工人階級不僅有需要教給城市知識份子關於工作和剝削的真實世界，他們也在實現社會主義方面也更有經驗。在很多方面，他們比有些年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左派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有更充分的理解和運用。

與此同時，社會迅速的兩極分化已經讓許多新興中產階級成員不管他們的具體職業或地位如何，面臨類似工人和農民遭遇過的情景，造成讓工人和農民團結起來的更大的基礎，幫助形成左派復興的群眾基礎。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吞噬自己，並迅速和更大的群體疏遠。當今，就連許多從前在國有企業工作的黨的幹部在把企業賣給私人投資者後也被踢出來了。新的資本家老闆不喜歡他們。有個工人把這個現象描述為“過河拆橋”。結果，他們中間不少也下崗了，清楚瞭解到“市場化”的真實含義，“它提高人們的覺悟啊”。

從自己的親身生活的變化中得到新的理解是非常普遍的。我們聽到很多這樣的故事，最初贊成鄧小平改革的人，比如我們在北京採訪過的進步思想的學者，現在傾向於毛澤東路線，甚至重新考察文化大革命本身。在有些情況下，這就是他們“從群眾中學習”的直接後果。一個著名的人物，從前非常保守的來自農村的學生，就是如此，他的轉變是因為他採訪農民的時候，從來沒有聽到一句對毛澤東的批評，但是對鄧小平的批評很多，迫使他重新考慮對過去的態度。但是這種重新評價有比個人經歷更深刻的根源。對於許多人來說，包括知識界的精英，自從改革時代興起的各種意識形態趨勢，從黨政宣傳家們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私有化理論到主要來自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圈子裡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都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現在發生的情況。

正如一個從前的紅衛兵現在的激進知識份子在不同的訪談中說的，嘗試了任何別的東西，那些最初贊成改革政策的人，現在摸索著理解發生的事情，“不得不回到文化革命時代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來對付當前的問題”，因為他們嘗試了別的途徑，但是並沒有找到解釋。

僅僅在幾年前，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是具體的，因而仍然是相對容易解決的，比如通過反腐敗運動，但是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問題是系統性的，難以解決的，需要更加根本性的改變，資本主義和全球市場沒有能力來解決，現在情形下的黨和政府也無法解決。結果，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提出的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批評就顯得具有現實意義，因為這些他們年輕時接受的教育的思想繼續提供對當前體制的徹底分析，看到日益增多的矛盾的根源，指出更深刻的解決

辦法而不是修修補補的嘗試。知識份子中許多從前的禁忌現在開始消失了。

甚至對於多數知識份子和精英中的人士來說都是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有人告訴我們如果誰表現出對文革的正面態度肯定被孤立甚至丟掉其事業，現在已經成為討論和重新評價的話題。這尤其出現在進行獨立歷史研究的年輕左派身上，他們發現長期被忽視的文獻，採訪那個時期的積極分子，在網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以別的方式挑戰官方對那個時代的評價。

還有其他很有意義的標誌左派復興和左派與工人階級鬥爭密切關係的事情。1999年我們採訪了北京的清華大學，常常被稱為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他們是參加小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現在尤其在名牌高校裡非常活躍的團體。我當時表示要想效果明顯，他們需要走出校園和工人階級結合，這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的學生沒有能夠做到的。在那次鬥爭中，雖然北京有很多工人，至少後來參加了，最後承受了暴力和鎮壓的苦果，但是學生和工人間並沒有實質上的聯繫。

比如，在東北長春，該運動的小規模版本，中國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工人拒絕參加到走出校園的大學生隊伍裡，使得學生遭到嚴厲鎮壓，這個慘痛的教訓讓他們重新考慮和工人階級孤立的處境。最後，正如中國歷史上常出現的，駐紮北京的部隊拒絕執行命令，是從外省調來的主要由農民組成的軍隊平息了天安門事件。那次教訓對年輕的學生左派仍有意義，2004年夏天的變化實在太戲劇性了。如今相當數量的學生積極分子離開校園和工人階級接觸，研究他們的工作生活條件，提供法律和物質支援，在工廠和農村進行考察研究後返回學校做調查報告。

鄭州一個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現在仍然是主要的左派運動組織者解釋說為什麼學生和工人階級的關係發生重大改變。早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高校的領袖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觀該鄭州的工廠。從2001年到現在，清華的學生組織每年都來參觀。2004年，來自北京另一個名牌高校的80名學生來到鄭州。政府當局非常擔心這樣的聯繫，試圖阻止他們。文革期間政府為願意到全國各地參觀的學生提供免費火車和鼓勵措施，但是現在政府試圖阻止這種流動，甚至出售學生團的車票，不讓他們在鄭州下車，但是學生仍然來。他們來到工廠裡，在鄭州工人運動的早期階段有些生活在工人中間，試圖幫助阻止對工廠的包圍。鄭州運動開始後，開始蔓延到東北地區或其他地區，甚至擴展到農村，學生來到村子裡進行同樣的活動，帶來資料，建立聯繫，提供法律服務，打破了許多農村積極分子感到的孤立狀態。如今在北京大學，還有眾多其他高校，成立了一個叫做“農民之子”的組織，雖然名字如此，仍然包括很多“女兒”，就是為了這個目的。1999年我們見到的左派積極分子，當時非常孤立直接調查工人階級

狀況，鼓勵別人也這樣做，到了 2004 年，學生們好像積極性非常高，不再需要像他這樣的組織者了，現在是學生主動要這樣做了。

這個運動是大學生群體構成和條件的變化促成和推動的。自從 1999 年以來，大學生人數增長了 3 倍，大量來自工人家庭的學生，多數人經濟上非常困難，畢業後找工作又不容易。結果是日益擴大的大學生和工人 農民相互同情和團結的社會基礎。當今的中國大學和改革初期相比不再那麼特權階層，作為對文革的回應，鄧小平強調“專”而不是“紅”，並重新恢復了全國高 考。結果，學生左派為精英知識份子和在工廠農村掙扎的人建立了橋樑，工人農民是他們的親戚，或者至少出身於這些家庭。在某些方面，中國當前的情形和俄國革 命的早期非常相似，列寧領導馬克思主義學生到工廠和工人在一起。當然，關鍵的區別不僅是多數學生來自工人農民家庭，而且年輕的中國左派即使摸索怎樣與工人 建立新型的關係，背後仍然有在毛澤東領導下的 50 年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那個時代的觀念，政策，關係不能也不應該不加修改地應用在變化很大的當前社會。但是，它們仍然是革命思想和實踐的巨大寶庫，左派可以從中吸取營養對付工人階級在當今資本主義改革和全球市場化面前的處境。左派思想不是新的東西，是早就 紮根于工人農民內心深處的思想。

但是，誇大這樣的趨勢是嚴重的錯誤。中國左派作為政治力量仍然是非常小的，邊緣化的，派別林立的，就像 工人階級的分裂一樣。就像全球的左派一樣，他們得面對從前熟悉的世界的崩潰，試圖尋找新的前進道路，沒有任何一套統一的概念用來組織左派，用來動員工人階 級。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是工人農民自己走在前面，進行非常艱難的鬥爭。雖然這些鬥爭常常是由本領域內的左派分子領導，但是作為整體的左派運動到現在為止幾 乎沒有。新的意識形態形式包括自由改革主義，社會民主思想等也對左派分子提出挑戰。美國情況的最新發展，甚至“階級”這個詞已經很少使用了，相反常常說的 是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剝削的概念不那麼明顯了。這些趨勢由於許多城市專業人士無論政治立場如何，的生活方式進一步強化。有些知識份子，包括把自己看作 左派的人，在城市裡賺了大把的金錢，和工人階級基本沒有任何聯繫了，工人的生活狀況和知識份子越來越遙遠了。

對於不願擔任公職或者不願 意把思想付諸行動的人，壓抑是常見的，雖然不一定集中在左派或右派上。相反，政府是否採取行動更多的是被接受的框架能走多遠的問題。甚至一個贊成改革，鼓 勵土地私有化以便讓農民變成獨立的市民的民工組織者也被抓起來了，因為在北京開會鼓吹人權。任何公開的組織性的嘗試要終止一黨統治都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任 何破壞國家對公眾活動控制的行為都會遇到麻煩，不管具體的政治內容如何。

但是，左派被當局特別對待，因為它有潛力組織迅速增長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典型的情況是關閉中國工人網站及其言論版。和其他別的論壇不一樣，這個論壇“是中國首個左派開辦的網站讓工人農民談論他們保衛中國社會主義的鬥爭。”在上面，知識份子，包括工人階級自己能夠“參與討論工人和工人問題。”(Stephen Phillion, “採訪嚴元章” <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phillion130306.html>). 這種連接對黨和政府領導人造成威脅，因為正如北京網站編輯部成員說的，“政府不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正是這個基礎“工人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和當今的共產黨區別對待了”。從工人階級的立場來看，讓公眾聽到自己的聲音非常重要。“這是社會主義民主希望的東西，因為工人有資本主義無法提供的民主。”但是網站被關閉了，因為工人階級成員無法支付的高額註冊費用。

在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以及新興中產階級內部，有個非常廣泛的要求經濟和政治體制更大的透明度，以及參與影響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決定的權利。雖然美國式的民主選舉仍然缺乏廣泛的吸引力，許多人在公開討論民主權利問題。對他們中的有些人來說，言論自由是主要目標，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成立反對黨是目標。許多工人現在甚至討論“一黨制為什麼不行”。討論甚至在黨內出現，尋找方法得到公開辯論的更大空間，和“公民社會”的出現。非政府組織大量出現涵蓋廣泛的議題比如女性權利和環境保護問題等。

親民主的感情非常普遍，政府知道它沒有辦法壓制，因而通過引進緩慢的改革來迎接這個挑戰。但是官方在這個領域的改革政策比如基層民主選舉儘管表面上看非常民主，常常讓工人階級懷疑，因為選舉被用來當作上級認命的合法化工具。這裡和許多其他領域一樣，社會主義時代的記憶，尤其是文革期間工人農民在管理工廠和農村時，甚至大學和地方政府的參與仍然作為基準，和現在所有這些權利都被剝奪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正如一個工人所說“政府到現在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澤東的革命顛倒了，讓工人的生活顛倒了，這是對工人階級的報復。”

因此，政治改革可以接受的途徑的關鍵是再次找到辦法把左派關於工人，農民控制的參與民主制結合起來，這是全球進步主張的一部分。這個研究已經開始了。2004年老左派給胡錦濤的信中，其中一個要求就是從下而上復興群眾運動作為控制權力濫用的監督，讓工人階級作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發揮黨和政府功能的直接作用。建立一個聯合的運動和推行這樣的革命性變革的障礙在中國是巨大的，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大。儘管有過去的遺產，年紀大的工人和農民非常擔心社會主義鬥爭的新程度不能很快實現，革命時代的記憶很快就會消失，年輕一代除了加入消費文化，發財賺錢外什麼也不想。那樣的話，他們就需要從頭重新開始，就好像他們是否最後能面對根本改變的需要。

但是中國人有個優勢，那就是他們曾經進行過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前景看起來好像很遙遠，中國有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重新革命的快車道，這個發展將再次震動世界。當然，這只是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發生的情景之一。階級結構的複雜化和兩極化把中國引向兩個相反的方向，未來的結果確實非常複雜。

這個狀況在最近的事態發展上表現得很明顯，不僅體現在工人階級本身的情況，而且體現在黨和政府對新挑戰做出的反應。為了避免農村更大規模的動盪，中國最高領袖胡錦濤和溫家寶已經提出了一系列的農村政策的變化，已經帶來明顯的影響。包括取消農民的農業稅，和其他許多費用，其中許多都是非法徵收的，這些往往是引發抗議的源頭。還有些計畫要增加在農村地區的投資，包括小城鎮和農村的工廠，尤其是農村教育和醫療，環境保護等。連同對於農產品價格的優惠措施，這些調整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許多農民家庭的經濟負擔。現在甚至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討論，雖然這個說法的具體含義根本不清楚，也許僅僅是給已經推行的農村政策好聽的左派效果而已。就連已經宣佈的改革中的措施的深度都還不清楚，尤其是考慮到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不執行的歷史記錄，這是中國政府管理的痼疾，比如腐敗的地方官員把村子裡的土地賣給開發商的做法在很多地方得不到制止。但是，有一個影響是非常清楚的。和僅僅二三年前的情況截然相反，沿海出口企業為主的地區在經歷民工荒，因為大量民工返回家鄉或者到離家鄉近的內地城市，一個原因是村裡條件的改善，另一個是沿海工廠的殘酷剝削。民工這個相反方向的流動反映了他們的高漲的覺悟，抵抗和自我組織能力，多數人已經是有經驗的工人，他們不再願意接受早些年吸引他們的工作條件。甚至年輕的民工，尤其是工廠喜歡的貧窮的農村婦女工作條件最為惡劣，現在也開始萎縮乾枯了。

雖然這個情況有迫使出口企業考慮提高工資，改善條件以繼續吸引大量勞動力的積極影響，但是也有跡象顯示企業老闆開始降到最低點的苗頭，把工廠遷往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孟加拉。沒有簡單的辦法改變現在的趨勢，因此，既然每個行動都帶來更多的矛盾，考慮到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中國已經陷入這個困境動彈不得。雖然國內市場在發展，全球競爭力的任何嚴重下降和由此造成的經濟衰退---這是中國領導人的最大夢魘---都將不僅破壞胡溫企圖進行的修正政策的能力，包括新強調的“社會平等”，還將帶來社會大動盪的威脅。

資本主義市場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將給予左派新的力量。左派日益增大的影響力的顯著例子在 2006 年 3 月非常明顯：

十年來或許是第一次，共產黨領導下的立法機構全國人大見證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辯論，許多人認為這些早就被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掩蓋了的。

這個爭論迫使政府擱置了本來期待贏得通過的《物權法》草案，突出顯示了一批數量雖小但影響不小的傾向社會主義的學者和政策顧問的力量。這些老左派思想家利用中國增長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穩定提出他們對政府推動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憂慮。那些指責這些攻擊是返回過去的人低估了社會主義理想在當今貧富差距明顯，腐敗猖獗，虐待勞工，掠奪土地的中國持久的吸引力，顯示中國是多麼嚴重地背離了其官方意識形態。(紐約時報 2006 年 3 月 12 日)

雖然《物權法》草案未來肯定以某種方式通過，“允許市場在教育 and 醫療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的建議，甚至更激進的土地私有化的建議至少現在遭到了挫折。

即使最高領導也覺得必須至少在表面上再次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這畢竟是政府和共產黨執政的理論基礎，雖然推行的資本主義的做法。

2002 年胡先生上臺之初，就試圖建立自己的左派信譽，讚揚馬克思主義，稱讚毛澤東，資助研究如何把人們忽略的國家官方意識形態和當前的現實結合起來。(紐約時報 2006 年 3 月 12 日)

為了恢復共產黨削弱的合法性，毛時代的做法被重新復興，人們普遍認為它太腐敗了。

就像一個擔心組織混亂，公共形象受到破壞的大公司，中共試圖重新讓自己變成高效運轉的現代機器。但是為了做到這些，它採取了最古老的政治工具，毛時代的意識形態運動，要求黨員必須進行先進性學習。

共產黨的七千萬黨員被要求進行 14 個月的學習，閱讀毛澤東鄧小平的演講，以及已經麻木的超過 17000 字的共產黨章程。強制性的會議還包括幹部必須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階段。(紐約時報 2006 年 3 月 9 日)

有些人認為這是對改革的努力改進而嚴肅對待，有些人則玩世不恭地對待，這次學習運動的直接影響也許不那麼重要，而是承認共產黨已經遠離了毛澤東號召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更不用說和最初的革命目標相比了。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話，會期待胡溫要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復興，或者會在資本主義道路上做出重大的改變，這是黨和政府過去 30 年來一直在走的路線，經濟增長也全依賴於此。但是官方推動的對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只能為左派復興討論積聚的危機提供更大的空間，改變朝向僵化和最近的全球論壇的孤立趨勢，通過新的和迅速擴張的全球通訊和組織的網路，不斷增加世界左派力量鬥爭的知識和密

切聯繫，儘管政府試圖 限制這樣的聯繫。

工人階級迅速惡化的條件讓他們走向極端和好戰的方向。不僅工人和農民，在許多知識份子中間，至少在有些更廣泛的新中產 階級，深刻和增加的瞭解全球資本主義不是改善他們處境的辦法。他們在毛澤東時代建設的社會主義革命至少提供了今天前進的另外一個方向。在工廠在農村，中國 的工人農民不僅抗拒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但是他們知道的另外一個世界的記憶是可能的。從他們在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時代的生活，他們明白除了全球資本主義無 法控制的猖獗情況外還有其他選擇。

儘管有這個遺產，任何簡單的回歸過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改變的情況已經太多了，有太多的魔鬼 已經從瓶子裡面放出來，再裝進去根本不可能。過去的失敗和錯誤，連同它的成功和勝利必須重新評價，必須找到新的方法克服社會主義第一階段的局限性，不管是 中國的還是其他地方的。我們不好預測未來的階段鬥爭的方向。但是在向前走的過程中，在他們重新找到向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之前，中國工人階級或許回頭 看，結合他們的歷史、現實與當今全球運動的鬥爭，重新進行革命。

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

譯自：“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China” by Robert Weil